

“泛安全化”世界的生成与“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

钟飞腾

摘 要 众所周知，国际环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辨析国际局势走向也往往是这些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行为不断增多，以至于出现了从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向“泛安全化”世界转变的迹象。“泛安全化”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负和博弈与双输，在这样的世界中，安全边界的模糊导致国际合作弱化；成本收益考量让位于负和博弈逻辑，导致行为体的行为极端化；对“规避损失”的重视正逐渐压倒对“获取收益”的考虑，导致行为体的行为短期化；价值观外交盛行，导致国际关系趋于阵营化和孤岛化。事实上，处于差异性发展阶段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的理想世界中有着迥异的发展战略。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只要改变自己、融入世界就能获得较高收益，其中，中等收入国家获益最大。但是，在一个“泛安全化”趋势上升、负和博弈行为盛行的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重构自身的战略选择，即重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间国家”角色、重构迈向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和发展道路、重构“南南合作”模式、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才能在国际体系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全球南方” 大国战略竞争 “泛安全化” 成本收益逻辑 负和博弈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3&ZD331）的阶段性成果。

在冷战时期，一大批发展中国家^①采取不结盟战略，试图避免卷入美苏之间的冷战。与之类似，当前“全球南方”国家似乎也在中美俄等大国博弈中采取中立立场、不选边站队，但这种策略是否奏效仍有待观察。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在期待中国融入世界变成西方一员的战略企图落空之后，转而遏制中国，因而反复强调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言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伊肯伯里将中国归为“全球东方”而非“全球南方”，并认为全球正在形成“新的三个世界”。^②在美方看来，“全球南方”是站在美国这一边还是与中国团结在一起，将成为主导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不同的是，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全球南方”一员，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则从不认为它属于第三世界。

“全球南方”地理范围的不定和身份认同的混杂，其实正反映出目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时代特征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而确认当前的时代特征不仅是政策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术界应当认真关注的重大课题。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经历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后各国均比以往更重视安全，可以说世界进入了局部“泛安全化”的发展态势，即很多国家的行为呈现出双输的特征，其行为逻辑是负和博弈而非正和博弈。分化的“全球南方”群体构成了当前局部“泛安全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何去何从以及其与中国如何相处，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例如，对中国而言，局部“泛安全化”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所熟悉的发展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已有很大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高度重视研判国际局势变化，并且把准确认识国际形势变化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前提。就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处时代背景而言，美国实力提升乃至一家独大是当时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而当我们假定外部世界基本稳定且对自身保持开放和友好时，本国的发展战略主要就是充分利用时代赋予的战略机遇提升自己，为此，在这一阶段，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就构成了中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

当前，中国已经崛起为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经济大国，不仅被美国视作头号挑战者，也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改变了

^① 由于“全球南方”是近期兴起的学术话语，在早期学术界多以“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概念来指代一大批欠发达国家，为此，本文在论述早期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时，部分仍采用“发展中国家”等术语。

^②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pp. 121-138.

与美国的关系，也在塑造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以中印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既呈现出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的态势，彼此间也不可否认存在对领导权的竞争。同时，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止步不前。新任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表示，“我们生活在……两极分化和极端化加剧的时代。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正在使‘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分崩离析，使进步的前景变得复杂化。”^①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即便在安全竞争加剧的时代，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在倒退，这意味着无论是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重点研究“全球南方”怎样才能顺应时势、摆脱不利境况，从而迈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本文认为，在“泛安全化”趋势逐步增强的时代中仍然蕴含着发展机遇，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发展、安全化和“泛安全化”的不同逻辑，以及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一员，并试图与“全球南方”成员一道来制衡美西方霸权的打压遏制，其重要前提便是准确理解和认识“泛安全化”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可能的战略选择，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在影响，而这将是本文所要阐述的核心研究问题。

一、从发展导向的世界到“泛安全化”世界

与 21 世纪初相比，当今时代的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安全因素在各类决策中的分量显著上升。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曾宣布德国进入“时代转折点”，^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提出俄罗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③ 与之相比，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7 年就对外公开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④ 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把握。面对中国的发展，特朗普第一任期便将中国界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此举标志着美国改变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对华战

① “Remarks by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Ajay Banga at the 2023 Annual Meetings Plenary,” World Bank Group, October 13,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3/10/13/remarks-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ajay-banga-at-the-2023-annual-meetings-plenary>.

② 《美媒：德国走向“时代转折”并非易事》，人民日报海外网，2023 年 4 月 20 日，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41083/2023/0420/content_32593948_1.html。

③ Stephen R. Covington, “Putin’s Revolution and War at a ‘Historical Crossroad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2024, <https://www.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7/Putin%E2%80%99s%20Revolution%20%26%20War.pdf>.

④ 《习近平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251.htm。

略定位。这既是霸权国对外政策的系统性变革，也是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兆。

毋庸置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定位发生逆转，无疑是牵动世界各国的大事，也预示着世界的运行逻辑正发生重大调整。在美国看来，对华实施技术遏制是为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时任美国财长耶伦声称，“国家安全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至关重要。保护某些技术不受中国军事和安全机构的影响符合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即使它们迫使我们权衡我们的经济利益。”^① 同样地，中国也严肃对待美国政府的此类举动，中国领导人不仅公开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评美国，^② 而且认为美国实施“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一种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的系统性行为。^③ 相较于美国从自由贸易立场的倒退，中国则不断向世界重申中国坚持开放并始终拥抱全球化的姿态。^④ 可以说，中美在对待全球化方面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舆论认为两个大国正陷入一场广泛而重大的持久冲突中，但两国的应对策略却如此不同。对世界局势走向研判的重要不同，显然是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中国不愿意、也不会与美国陷入“新冷战”的重要依据。

那么，被视为主导大国政治的世界政治运行逻辑，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是仍处于变革之中？如果我们假设其已经发生根本转变，那么，各国的主导性行为逻辑就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安全优先。如果说其正在转变中，那么少数国家有可能更侧重安全而另一些国家仍以发展为主，但这一局面若不加以改变，未来就有可能出现所有国家均将安全置于发展之上的结果，最终各国会陷入一个过度安全化甚至如霍布斯所定义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世界。当前，各种力量交锋激烈但还未完全分出胜负，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对于不同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将是什么状态以及相互转换的机理，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辨析。

（一）世界运行的四种逻辑及其理想形态

就理论层面而言，我们可以将世界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分别由不同的行

①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the U. 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pril 20,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425>.

② 谢环驰：《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3月7日，第1版。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③ 陈一鸣、宋静思、李学仁：《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9日，第1版。

④ 《习近平会见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1日，第1版。

为逻辑主导，进而将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罗伯特·杰维斯曾根据某一国是采取进攻性策略还是防御性策略，以及能否区分进攻性意图与防御性意图，推导过四种可能的世界图景。^① 杰维斯的这一分类完全聚焦于安全领域，而本文则涵盖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更具有普遍性。与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不同，本文更加强调国际社会具有层级制特性，即大国的作用更加突出，多数时候中小国家间的局部冲突尚不能决定一个世界的基本特征。本文的另一项基本假定是，国际政治具有进化或者变革性特征，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主导性逻辑，虽然同一时代也可以容纳多种类型的行为逻辑。无政府状态和层级制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被构想为桌球游戏，每个国家都是彼此独立的“碰碰球”，而后者则认为国际社会中不仅有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约束国家行为的力量，而且各国不能被简化为同质行为体。实际上各国彼此间往往呈现不平等的状态，其中，大国的作用更为突出，特别是大国关系决定性影响着世界的状态。为了使讨论更为清晰，本文根据当前的世界状况，假设世界由一个 A 国（崛起国）、一个 B 国（霸权国）以及其他国家组成。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简略地归纳出 A 和 B 两国关系的四种理想状态以及处于这两个核心国家影响下的世界形态（见图-1）。下面将具体介绍这四组理想的世界运行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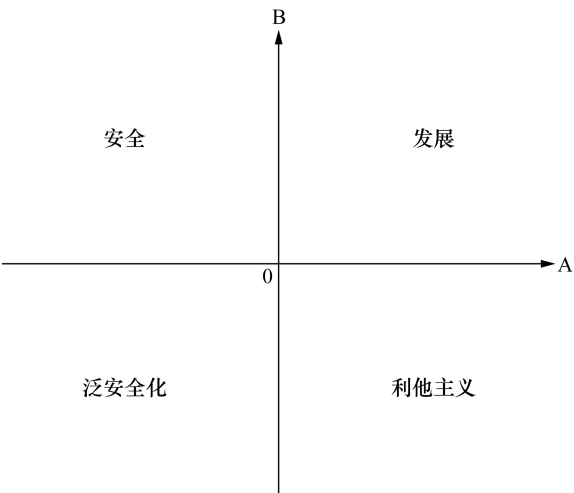


图-1 A 国（崛起国）和 B 国（霸权国）之间的四种理想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载詹姆斯·费伦等：《理性与战争——国际政治实证研究精选》，方松英等译，商务印书馆，2024 年，第 68—73 页。

第一，正和博弈。在第一象限中，崛起国 A 和霸权国 B 形成了正和关系。在理想状态下，两国都能获得对等（尽管不完全是相等）的收益。即便不能获得相同的收益，在第一象限框定的世界中，各国只要交往均能产生积极利益。在这个象限中发生的互动行为，其主导性逻辑是自由主义的，即大多数国家将以发展与合作为行为导向。因此，这样的世界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安全的，其也可以被称为“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造了“复合相互依赖”这一术语，但其在《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也指出，复合相互依赖只是一种可能的世界形态，例如，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后，“现实主义”则比“复合相互依赖”更适用于描述中美关系走向。^①

第二，零和博弈。在第二象限中，B 国获得正向收益而 A 国则只有负向收益，两者的关系近似于零和博弈。更多的互动形态将是 B 国通过与 A 国建立联系获得不对称收益，并且这种收益是以 A 国的损失为代价的。这种状态曾被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很多依附论学者所批判，同时，该状况也类似于很多北欧学者讨论过的“安全化”现象。^② 各国的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常常将某个议题视为安全问题，从而借此获得议题关注优先级和民众的支持。而一旦某个议题被“安全化”，则往往意味着其他议题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源，因而“安全化”的过程也被简要概括为零和博弈。^③ 在博弈论中，有限次囚徒困境博弈通常符合这一状况，但是按照囚徒困境博弈推导出的结果与自由主义的预期是完全相反的，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集体利益最大化并不一致。在国家间关系中也存在这一逻辑，很多国家经常以安全问题为借口，将某些议题的优先层级进行任意转化，并以此在国际谈判中谋求优势地位。当两个大国的关系陷入零和博弈时，其总体表现为一方的收益将以另一方的损失为前提，冷战时代的世界就呈现这样的显著特征。

第三，双输博弈。在第三象限中，A 国和 B 国的博弈呈现双输局面，即我们通常所谓的负和博弈。参与博弈的 A 国和 B 国均没有从两者关系中获益，彼此遭受的损失可以是对称的，但显然更多时候这种损失之比并不相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1—2 页。

② Olav F. Knudsen, “Post-Copenhagen Security Studies: Desecuritizing 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3, 2001, pp. 355-368; 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0 期，第 21—26 页。

③ Daniel W. Drezner, “How Everything Became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Became Everything,” *Foreign Affairs*, Vol. 103, No. 5, 2024, pp. 126-128.

称。这既要看到双方在具体事件和问题领域的力量对比,也要看到双方总体的实力对比和行事谋略。^①张宇燕和冯维江曾指出,“中美分道扬镳或者发达经济体及其紧密伙伴将中国排除在它们的贸易与金融体系之外,其结果显然是一个负和博弈,至于双方谁受损更大或谁更输不起,则取决于双方在相互依赖关系中谁更脆弱。”^②对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状态,中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③高程曾将这种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方的行为概括为“大国间经济关系出现安全化”。^④事实上,这一现象更接近于本文所界定的“泛安全化”,其是比安全化更趋恶劣的一种状态。当世界处于“泛安全化”状态时,各方面对的将不是谁获益多、谁获益少的问题,而是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获得正向收益,下文将重点对此进行分析。

第四,利他主义。在第四象限中,A国获得正向收益而B国则是负向收益。通常而言,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是国际规则的建立者,而规则又被广泛认为是非中性的,实际上有利于规则的制定者,^⑤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霸权国建立国际制度和规则绝不会损害自身利益。^⑥例如,美西方坚持认为各国均应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俄罗斯等国对此却并不认同,认为这些规则并不能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不能反映新兴力量的正当需求。那么,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而言,当它在自身出现损失后仍愿意维持和另一国的合作关系时,我们可将这种行为称为利他主义。当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通常不认可这一点,他们假定国家是自利的,“就与人性一样,个人和群体的政治行为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所驱动。”^⑦利他主义从

① 即便是挑战现实主义的制度主义者,也试图区分总体性权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权力,可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对海洋、货币等问题领域国际制度变迁的分析。

②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5页。

③ 在中文典籍中,类似的表述还有“杀人一万,自损八百”,参见翟灏撰:《通俗编附直语补证》,《通俗编》,第38卷,颜春峰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1128页。明代将领戚继光也曾提出:“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此谓势均力敌者立说也。”参见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三,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与戚继光同时代的杨慎则采用“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说法,参见杨慎:《丹铅总录校证》,中华书局,2019年,第495页。

④ 高程:《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人民论坛》,2024年第5期,第82—86页。

⑤ 关于制度非中性的相关论述,可参考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⑥ Stephen G. Brooks, “Can We Identify a Benevolent Hegem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 2012, pp. 27-38.

⑦ 威廉·沃尔福斯:《现实主义》,载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邓肯·斯尼达尔编:《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方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43页。

来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因而很少有现实主义理论家会倾向于认为霸权国出于帮助他国目的而提供公共产品。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仁慈”的霸主。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难找到支撑上述四种理想类型的各种案例。例如，自由贸易通常被认为与第一种情况所表明的正和关系相对应，其中，两个国家都能从彼此关联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正向收益。第二种理想情况也容易找到实例，如美联储通过操纵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让其他国家为其承担成本。第三种情况则比较少见，例如，可能有的事例包括世界性大战以及缔约双方退出自由贸易协定等。而最近发生的典型案例则是，2024年2月，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郑重其事地在其年度报告中以“双输”（Lose-Lose）作为核心议题。^①第四种情况则主要涉及某国通过单方面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免费搭便车，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对外援助等行为。仅就经济收益而言，援助是援助国的损失、受援国的单纯受益。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出现的新动向则是佐证，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援助国，美国越来越觉得援助是得不偿失的。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刚就任总统便立即发布了《重新评估和调整美国对外援助的行政命令》，决定暂停美国对外发展援助90天，以评估援助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②

（二）从安全化到“泛安全化”的世界

毋庸置疑，鉴于霸权国的力量首屈一指，其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生活在当代世界中的人们对此不难理解，各国均极为担忧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就是显著的表现，因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如何转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或者说霸权国按照何种逻辑行事，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持久争论的难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以大国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帝国论、均势论还是制衡理论，其核心都是讨论大国的行为特征以及大国处于不同地位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总体而言，在霸权国主导地位处于稳固时期，它对其他国家表现出宽容和大度的一面。而当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挑战者时，体系主导国则寻求压制崛起大国，以维持该秩序的运转。从宽容到压制是霸权国对外政策的巨大转

① Tobias Bunde, Sophie Eisentraut and Leonard Schütte, eds., *Lose-Los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4,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4_Lose-lose.pdf.

② “Reevaluating and Realigning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evaluating-and-realigning-united-states-foreign-aid/>.

变,但是,与此同时,崛起国也在迅速缩小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权力转移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当两个国家实力对比达到何种程度时霸权国的政策将发生显著变化。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的决策者曾提出这一门槛值为 60%,这显然要小于权力转移理论家预测的 80%—120%的区间值。^①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反复讨论的,即便是实力强大的霸权国,其在压制对手时也会采取两手策略,或是奉行单边主义,或是联合盟友对崛起国进行打压。^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霸权国感到力不从心时,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以及制衡竞争对手的需要,霸权国通常可以容忍与自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并试图拉拢这种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便是这一逻辑的完美体现,苏联的最终解体也是冷战时期零和博弈核心逻辑的直接后果。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曾围绕国家究竟是重视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基本目标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比本国更多的收益,这种观点被称为相对收益论。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各国最根本的目标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会在乎他国的收益多寡,因而他们假定国家更重视绝对收益。已故美国学者罗伯特·鲍威尔曾指出,“关于国家偏好的哪种假设更有用?在更广泛的理论背景下,至于哪一个假设会产生更好的见解,关于这一点的任何确切判断都必须留待进一步的工作加以解决。”^③随后兴起的预期理论,则利用心理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了这场大辩论,解释了国家何时会采取合作或者不合作的行为。该派学者强调,虽然国家本身不会做出决断,但毕竟各国的外交政策仍由政府中的个体最终决定,因此分析影响个人选择的认知结构非常重要。该理论在考察决策者的认知因素时依赖于实验观察得到的一项结论,即人们感知到的差异与客观测量得出的差异有所不同。例如,人们在拥有两支蜡烛和一支蜡烛的房间中所感知到的亮度差异,要远大于在拥有 21 支蜡烛和 20 支蜡烛的房间中的照明差异。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下这两个房间都只差一支蜡烛,但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完全不同。

① 有关文献可参见钟飞腾:《中国式现代化与中美竞争》,《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74—76 页。

②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45;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2-108; 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1 期,第 4—24 页。

③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1991, p. 1316.

再如，人们通常认为，10元和20元之间的差异要比100元和110元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心理学家将这类感知差异称为“比率差异效应”（Ratio-Difference Effect）。当合作或者不合作之间的收益差距很大时，双方均有动力采取不合作政策。而当合作或者不合作导致的收益差距很小时，双方都会继续维持合作政策。因而，这一派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当国家面临诱惑或恐惧的比率差异较大时，它们更有可能像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行事。而当比率差异较小时，国家往往会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预测行事。”^①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崛起国的实力地位越接近霸权国，两国的冲突越会加剧，因而更容易出现“泛安全化”的情况。

最近一些年中美关系的恶化似乎印证了理论的预判。国际关系学界包括美国决策层都提出，当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实力达到美国的60%时，美国就会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立场，开始对崛起国实施围堵、遏制和打压。^②而在经济学界，有关这种转变最知名的论断来自曾经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萨缪尔森，他于2004年从理论上推断出中美间和谐的贸易关系建立于中国永远出口纺织品等中低端贸易产品基础上，一旦中国进行技术升级，美国利益就会受损，因而美国彼时就不应该继续维持对华自由贸易。^③张宇燕和夏广涛在萨缪尔森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绝对福利和相对福利设定为国家的“双重目标”，他们认为，当后发国家也追求“双重目标”时，先发国家往往倾向于更重视相对福利，使其与后发国家的博弈从合作走向竞争乃至脱钩，最终出现损人不利己的局面。^④这类分析表明国家间关系同样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按照图-1设定的四个象限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断出国家间关系从量变到质量演变的标志之一是，霸权国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从第一象限到第三象限的逆时针运动态势，即从重视绝对收益的正和博弈，转向奉行损人利己的安全化政策，再到推行损人不利己的“泛安全化”策略。

从理论层面看，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避免国家间陷入“双输”局面是理性的，但是当相对优势地位不再时，霸权国采取“泛安全化”策略同

① Matthew Mulford and Jeffery Berejikian,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and the Gains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2, 2002, p. 220.

② Kurt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 99.

③ Paul A.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 3, 2004, pp. 135-146.

④ 张宇燕、夏广涛：《贸易、权力与福利：大国博弈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26—46页。

样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一旦跨入“泛安全化”这个境地，自身国力都将经受持续不断的损耗。这种状况不仅消耗各自的物质实力，在道德上也容易遭到别国的批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将极大损害两国的国际威望和可信度，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霸权国不必这么极端行事。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维持霸权的某些时刻而言，霸权国进入“泛安全化”状态并不是非理性的，反而是主动推进的战略性安排，其甚至会有意诱导其他国家进入这个陷阱。主动布局的一方往往相信在“泛安全化”境遇中对方的损失会更大，同时它又认为，由于自身拥有雄厚的实力因而能够经得住长期的消耗。罗伯特·吉尔平曾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指出，成本收益逻辑是霸权国的主导性逻辑，当一国的收益少于成本时，扩张就会停止。^① 吉尔平实际上仍假定霸权国的地位要远高于其他国家，霸权国只需要考虑自身的成本收益状况，而无需关注他国。张宇燕等人的分析逻辑则明显不同，他们所考察的两个大国在追求“双重目标”时至少有 49 种博弈情形，其中有关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和先发国家技术遏制的博弈类型共有 7 种，因而博弈进程包括了后发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及其战略选择。^② 本文所界定和分析的“泛安全化”世界与吉尔平设定的世界有所不同。吉尔平在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是否会进入霸权战争时曾指出，“尽管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仍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使苏联经济相形见绌的。”^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美国霸权已明显衰落，霸权国不再拥有相对于崛起国的显著优势地位。

在霸权国力量显著衰落时，霸权国将从重视权力转向重视安全。这一论点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也有很突出的体现，沃尔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从古典现实主义推崇的权力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为什么沃尔兹认为国家会从注重权力转向注重安全？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沃尔兹进行理论建构时恰逢苏攻美守，即便苏联的权力地位远不如美国，但美国在面临苏联的挑战时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因此，沃尔兹的理论建构就接受了美国行为逻辑发生变化这一前提，美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主动改变了对外政策，中美和解就是这种政策变化的主要体现。在此场景下，更弱的安全感要比更强的权力地位更能推动美国对外政策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② 张宇燕、夏广涛：《贸易、权力与福利：大国博弈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第 26—46 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185 页。

的调整。与冷战时期面临的苏联相比,美国当前越来越认为中国是其建国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例如,2022年10月,时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回应拜登总统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声称,“该战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我们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①由于这一论断是在俄乌冲突之后表达的,国际舆论对此感到非常吃惊。此外,美国战略界人士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大多数方面的能力都超过了冷战高峰期的苏联”。^②在这样的一种战略预期指引下,尽管“双输”博弈会损伤自身实力,但只要能够不断消耗对手,对美国来说其仍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本文进一步解释了美国形成“泛安全化”政策的逻辑及其理想目标,并揭示了美国是如何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并最终滑向负和博弈的历程。

在“泛安全化”世界中,霸权国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成本收益情况,还要观察挑战者的成本收益曲线。这既是其坚持相对收益逻辑的表现,也是该逻辑的进一步深化,即衰落的霸权国倾向于给崛起国造成损失。在某些时候,霸权国的行为逻辑是,即便自身已经损失惨重、资不抵债,但只要还没被清盘,而且对手损失比自己更大,那么伤害对手的行为仍会持续,霸权国挑起各类事端和将各类议题“武器化”的行径也将更加普遍。事实上,深入理解霸权国的行为逻辑对于我们准确研判未来局势走向至关重要。整体来看,无论是拜登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导向,还是特朗普政府当下的对华战略定位,其对华合作权重都有所下降和萎缩,而竞争成分却大幅上升。可以说,我们正在迈入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泛安全化”特征。“泛安全化”世界兴起的首要原因似乎是美国切实感受到自身难以逆转的国力衰退,因而决心与对手开展“负和”博弈或者说实施“双输”战略。概言之,美国要和中国竞争的是谁输得更多、谁最先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2024年10月,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曾承认,“一个首要问题贯穿于许多其他问题之中:我们的新做法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远离正和的世界观,即美国只是为了自己而牺牲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③事实上,如果没有

① “Statement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on Releas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13,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187178/statement-from-secretary-of-defense-loyd-j-austin-iii-on-release-of-national-s/>.

② Jennifer Lind, “Back to Bipolarity: How China’s Rise Transform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9, No. 2, 2024, p. 54.

③ “Remarks by APNSA Jake Sullivan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3, 2024, <https://2021-2025.state.gov/translations/chinese/20241023-remarks-by-apnsa-jake-sullivan-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excerpts-chinese/>.

人批评美国自私自利、损人不利己，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恐怕不会公开提及这一点。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正如很多人所预期的那样，其即刻决定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不仅如此，特朗普还于 2 月中旬发布《互惠贸易和关税备忘录》，认定其他国家利用对美贸易顺差“敲诈”美国，因而决定对所有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尽管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反复强调，美国消费者最终承担了关税战的后果，对美国来说提高关税也造成较大的利益损失，但特朗普的思考逻辑是，短期内美国虽有些损失，但长期而言关税对美国有利。^①

（三）“泛安全化”世界的主要特征

从理论上讲，即便在局部“泛安全化”的世界中，行为体的上述四种行为逻辑仍可共存，即各国仍可以选择合作，在某些领域也会维持零和博弈，甚至不排除展现一些利他主义行为。但问题在于未来世界会往哪个方向演化，只要挑战者或者其他新兴国家持续崛起，特别是当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地位不断接近时，霸权国就会越来越表现出“泛安全化”的行为特征，即不惜损耗自身收益也要打击和消耗对手。人们不难看出，正和博弈和双输博弈逻辑极为不同，一个“泛安全化”的世界与重视发展的世界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简而言之，“泛安全化”世界呈现出以下四种主要特征。

第一，安全边界模糊导致合作弱化。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主要被限定于“高政治”领域。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虽不断兴起，但安全仍被认为是专属于特定部门和特定领域内的事务。随着霸权国大幅扩展安全问题的领域和范围，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以“国家安全”为名出台大量保护主义措施，导致了安全的滥用和泛化。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虽然整体上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但某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出于狭隘的组织利益，为谋求特定事项的优先地位而将一些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一旦这种安全化操作溢出国界、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对他国来说，为了应对霸权国的无理打压，其也需要出台类似的反制措施，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双方的竞争，这将使几乎所有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议题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国家安全往往意味着不可让步的立场和难以确认的风险，并且在实施过程中高度不透明，这使得国家的行为变得难以预期，相关决策者也不愿快速决断，从而拖延相关合作事项的进展，由此导致各国合作的频率和效率大幅度下降。

^① Scott Horsley, “Trump Threatens Reciprocal Tariff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NPR,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2/13/nx-s1-5296521/trump-retaliatory-reciprocal-tariffs-inflation-trade-war>.

第二，成本收益逻辑让位于零和博弈逻辑，甚至负和博弈逻辑，导致行为体的行为极端化。随着安全议题的无限延伸，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行为体在合作前开始考虑“有”和“无”而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在面临“有”和“无”这种二元选择时，“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选择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各方进行交易和让步的空间也随之大幅受限，由此导致国家的决策思维倾向于极端化。例如，美国近期提出“友岸外包”的想法，强调与盟友以及所谓“志同道合者”加强贸易，同时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一旦这种趋势蔓延开来，那么美国与盟伴之间的贸易增量，往往就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的损失。更有甚者，美国还强行要求其盟友不得与中国在某些行业内进行贸易，这就造成了美国盟友和中国的双输局面。随着经贸议题“泛安全化”趋势的扩大，安全逻辑越来越替代正和博弈逻辑，导致国家间行为逻辑发生根本性变化，零和博弈与负和博弈的比重和频率大幅度提高。负和博弈根本不曾考虑互利共赢问题，其甚至都不如损人利己的零和逻辑，而是双方都遭受损伤，最终比拼的是各自的伤害承受能力。很显然，在负和博弈情形下，弱小的一方将首先被排除掉，最后剩余的是体型大、承受力强的大国和强国。

第三，行为体对“规避损失”的重视将逐渐压倒“获取收益”的考虑，导致国家行为趋向短期化。心理学实验已经证实，在安全风险加剧时，人类规避损失的倾向将进一步上升，人们彼时会极力获取眼前的利益，而较少愿意花费较长时间来做大蛋糕，对短期利益的考虑要远甚于培育长期利益，由此导致国家的行为短期化，合作难以维系。如图-1所示，霸权国B对待崛起国A有四种策略选择，它可以选择和崛起国A进行合作，即进入第一象限或者第四象限所设定的场景。在第一象限中B能获得收益，但在第四象限时B将遭受损失，因而在这两种状况下霸权国的战略思维都不是“规避损失”。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熟悉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行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其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并且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此时，包括A在内的一大批国家也倾向于和霸权国B保持合作关系。但是，当霸权国B不再认为与A保持合作有利于维持霸权地位时；B要么采取零和博弈，减少A国的权力，同时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B要么采取负和博弈，在减少A国权力的同时也承受自身权力遭受的损失。此时，无论双方处于何种博弈情形，对于A国来说结果都是损失。而当霸权国不再实施第一和第四种策略，转而更多采取第二和第三种策略时，A要么选择退出由B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依附论曾经建议的那样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钩；要么呼吁改革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

这是冷战时期不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采取的策略。总之，一旦行为体“规避损失”的行为逻辑占据上风，国家便不敢寄希望于他国对自己保持善意，国家间合作空间就会大幅度减少，其对外行为则趋于实现一次性获利而不是维持长期的合作。

第四，为了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和风险，霸权国倾向于加强与自身价值观更为一致国家的交往，导致国家间关系发展呈现阵营化和孤岛化。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是，两国之间距离越远，一国对另一国的控制就越弱。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也显示，距离越远的两个国家间的贸易量也越少。这种距离既是物理层面的，也可以是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在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中，企业根据稳定的、可估算的成本—收益预期，选择合适的对象国企业进行交易合作。然而，一旦行为体陷入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状态，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往往会频繁遭遇交易成本急剧上升的挑战。两国距离越远，不可控因素就越多，因而交易风险也会剧增。例如，因为国家间博弈造成的互相报复局面往往难以提前预测，双方企业很可能在货物远洋运输途中就碰到汇率和关税调整、甚至禁止入境等问题。此时，不仅企业将主动规避这类风险而减少彼此间交易，霸权国甚至也会明令限制本国企业与竞争国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了减少风险，霸权国倾向于和自身文化和价值观一致的国家进行包括贸易和投资等在内的各类交往。毫无疑问，霸权国及其盟友仍是世界经贸领域的重要国家，一旦霸权国转向和自身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交往，那么普遍联系的世界就有可能转化为彼此孤立的岛屿。当然，正如下文指出的，在世界岛屿化或者说区域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多个中心地带，这也有可能为“全球南方”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在国际合作弱化、行为体的行为极端化和短期化以及国际关系岛屿化的“泛安全化”世界中，各类事务的收益率也将下降。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解决收益下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拓展新的领土和市场，通过调整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来重新分配收益，近代奴隶贸易即是著名的案例。此外，正如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所证明的，只要两个国家持续开放，那么两国的要素价格就会出现均等化的趋势。一般认为，美国是资本丰裕的国家，美国政府是由资本家控制的，美国的开放政策有利于资本对外扩张、提高资本的收益率。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是劳动力要素丰富、资本欠缺的国家，劳动力从对外开放中获益更多，而本国资本所有者则不愿意向外开放。帝国主义者青睐领土扩张是因为新的领土不仅预示着新的市场，也意味着可以借此调整母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

家不同的是，二战后的美国并没有再度实施殖民政策，原因在于美国通过开放市场的方式调节了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丰富的资本所有者主动对外开放，从海外市场赢得较多利润，从而解决了国内市场收益率下降的问题。二是持续进行国内技术创新。一般而言，越是富裕的国家，技术创新的动力就越强劲，因为富裕的消费者能够支付超额资金购买创新性产品。帝国主义者能够这样做是基于两个前提，即实力地位远超其他国家和拥有创新能力极高的人口。而在一个“泛安全化”世界中，霸权国此时已经不具备相对于崛起国的绝对优势，而崛起国则成长为新技术和新思想的来源地，这将给“全球南方”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为了进一步理解“全球南方”的多面战略选择，下文将首先考察“全球南方”在不同的世界中的发展成效问题。

二、身处不同世界的“全球南方”的兴衰与分化

冷战时期，世界处于安全化阶段，各国的安全考虑具有压倒性优先权。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蓬勃发展。当世界分别处于安全化和发展导向阶段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业绩差异相当明显，显而易见，后者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发展中国家为何需要重视国际环境。同时，我们通过历史类比也能观察到，当面临有利的国际环境时，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造成重大的发展结果差异，其中有些国家抓住了战略机遇，但更多的国家其实没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一）利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导向世界

在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的推动下，“全球南方”概念曾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全球热议。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关注到“勃兰特委员会”于1979年发布的《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并在1981年4月出版发行了中文版，有意思的是，中文版书名被改为《争取世界的生存》。^①“勃兰特报告”发布之际，正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局势都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全球GDP增长不到2%，比1979年下跌2个多百分点，1982年更是下跌至0.3%，当时世界经济增速比

^① 维利·勃兰特：《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

石油危机冲击后的 1974 年还要低。^① 1974 年 4 月，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论断背后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一届联大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革命性宣言和行动纲领，也被视作“第三世界”进一步崛起的标志。但是从政治上看，1980 年前后也是大国博弈最为激烈的阶段之一，中美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1979 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构成了那个时期国际政治斗争的底色。当时，与“全球南方”的发展问题相比，安全问题牢牢占据了主要国家的首要政治议程位置。

尽管“勃兰特报告”提出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悬殊，并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但却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其原因既在于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在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总体呈现零和博弈的色彩，这些国家要么选择苏联，要么选择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国家实际上非常少。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中经济体仅占世界经济的 20% 左右（见图-2）。在这样一种力量结构下，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很难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尽管美国一些人士声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冷战后才扩展至全球的，但不言而喻的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转向拥抱新自由主义，就连一向支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都不再排斥跨国公司。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美苏缓和，特别是苏联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如果不与实力鼎盛的美西方搞好关系，发展中国家就难以获取对促进自身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援助、投资以及贸易机会。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令人瞩目，21 世纪的头 20 年是“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黄金时代”，按市场汇率衡量，“全球南方”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已超过 40%，比 20 世纪 80 年代翻了一番。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那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从 1980 年的 37.0% 增加至 2020 年的 57.7%，预计将在 2027 年突破 60%。^② 以“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的增幅来看，其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 20 年增加了约 7%，在新世纪以来的 20 年里增加了约 14%，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较之冷战时期，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要更有

①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指标数据库，参见《GDP 增长率（年百分比）》，世界银行集团，<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

②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参见“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October>。

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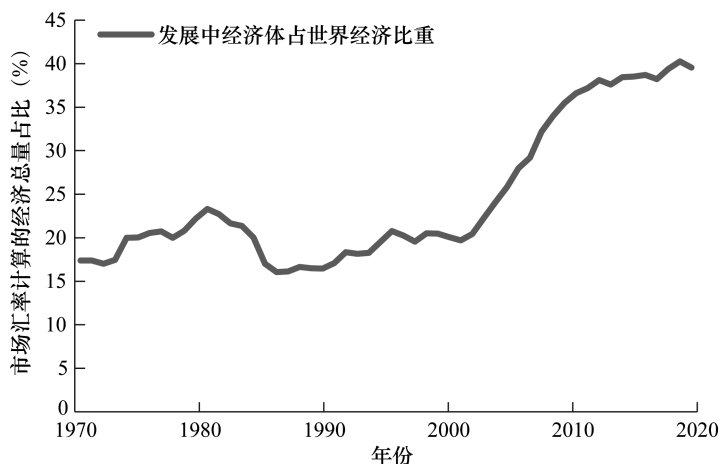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南方” 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UNCTAD，<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GDPTotal>。

以长期视角来看，当前“全球南方”已经崛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其崛起速度已有所放缓。在2018—2023年，“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56.7%增长至58.9%，6年间只增长了约2%。相对增长份额趋缓表明了两个态势：其一是“全球南方”崛起的速度减缓，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势头有所好转；其二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博弈加剧，尤其是后者推动有关“全球南方”话语构建趋向活跃。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的冲击下，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重要事实，无论是美国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美国胁迫众多国家围堵遏制中国，多数中小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队，为了规避被美国拉入阵营对抗，“全球南方”国家反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合自强。

（二）不同世界中更具优势的中等收入国家

回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处于不同收入层次的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全球南方”尽管在政治上更具有同一性，但很难被当作是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这一点和发达经济体有很大的不同。自身基础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容易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而位于国际体系底层的国家，不管身处何种世界，其想要摆脱困难局面都会面临极为艰巨的挑战。事实上，

在经济学家看来，摆脱“贫困陷阱”并不比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更容易。^①在 1961—2023 年的 60 多年间，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 3.2%、2.2%、0.2% 和 1.9%（见表-1），其中表现最好的不是高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似乎有悖于收入越高者选择机会越大的常识。但经济学理论对此也有一种解释，即后发国家在进入“起飞”阶段后往往会有一段高速增长的发展期，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最佳例证之一。事实上，在中等收入国家自身经济增长最好的阶段，国际体系往往处于“一超多强”格局，更准确地说是在美国实力遥遥领先的时期，而在美苏争霸时代，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表现要差很多。这也符合本文的理论推理，即由于其他国家与美国实力差距甚大，可以说当世界处于正和博弈阶段时，美国并不反对本国企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转让技术等活动，因而接受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努力学习外部先进技术，就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旦某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美国，特别是随着大国竞争加剧，霸权国的行为逻辑将从重视发展转向安全优先，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就是其中一例。当中国崛起为美国的挑战者时，霸权国推进“泛安全化”策略的倾向则更加突出。而当各国的行为也越来越“泛安全化”时，“全球南方”的前途和命运将可能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内部甚至出现更大的分化。

我们可以按照全球性重要时间节点将上述 60 年再切分成几个时期，以进一步识别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在各阶段的增长表现。这些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包括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91 年冷战结束和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重新审视各个阶段不同类型国家的增长水平，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下特点：第一，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各自保持最好增长水平的阶段存在很大差异。高收入国家的黄金增长时代是 1961—1973 年，而中等收入国家的黄金年代则是 1992—2008 年，在这两个时期，这两类国家的年均增速均在 4% 以上。第二，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堪称中等收入国家的“黄金三十年”。在 2009—2023 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速为 3.8%，仅次于其黄金时代的增速，但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却不到其黄金时代的一半。第三，所谓“全球南方”的崛起实际上主要是指中等收入国家的崛起。尽管低收入国家在 1992—2008 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 1.4%，是这类国家 60 年中

^①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4, No. 5, 2016, pp. 5-19.

好的发展阶段，但在这一时期，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速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其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中仍处于负增长。由此观之，中等收入国家要比低收入国家更能利用全球化，也更能承受住全球化减缓的冲击。

表-1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1961—2023 年）

年份 国家类型	1961—2023 年	1961—1973 年	1974—1991 年	1992—2008 年	2009—2023 年
世界平均	1.86	3.14	1.22	1.85	1.52
高收入国家	2.23	4.02	2.07	1.99	1.14
中等收入国家	3.22	3.26	1.88	4.10	3.78
低收入国家	0.21	0.70	-0.71	1.40	-0.2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

从地理分布看，那些在全球化时代群体性崛起的中等收入国家主要位于亚洲。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世界银行将各国按收入水平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目前更是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取消了“发展中国家”这种模糊分类，原因之一就是发展中世界的严重分化。当前，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似乎并不弱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若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21 世纪以来真正取得快速发展的只有 32 个经济体，分别是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拉美地区的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和巴西 6 国，非洲的南非、肯尼亚、安哥拉、加纳、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埃及 7 国，亚洲的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沙特、阿联酋、伊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土耳其、巴基斯坦、韩国、越南、孟加拉国、卡塔尔、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 18 国。除了俄罗斯、沙特、阿联酋、韩国和新加坡之外，这些经济体基本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位居前两名的中国和印度合计约占 32 国经济发展总量的 51%，排在第三位的则是印度尼西亚。^①

如果人们在 30 年后再度审视 21 世纪初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那么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将是最被关注的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进一步崛起也将给中等收入国家的群体身份定位带来挑战。不少学者预测，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

^① 钟飞腾：《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与百年大变局》，《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38—39 页。

国家，一旦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脱离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至少从统计学意义上看中等收入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显得不那么显著。到 2050 年前后，随着印度和越南等国也有很大概率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① 中等收入国家所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还将进一步萎缩。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身份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也会导致其行为逻辑发生变化。其背后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印度等国在崛起之后是否仍拥有“全球南方”的身份属性？中印的经济发展与身份分化，则可能是造成“泛安全化”世界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方面，如果未来中印等国与现有的发达经济体在身份定位上保持一致，那么发达经济体的主导地位将几乎是不可撼动的。不少研究曾揭示，随着日本、韩国崛起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就不再属于“全球南方”行列。^② 国际政治实践也表明，不少新兴经济体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后，确实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向美国立场靠拢。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统计分类中就将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列为发达经济体。^③ 如果不仔细识别，人们就容易相信发达经济体的力量仍很强大，新加入高收入俱乐部的这几个亚洲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达 3%–5%，在“全球南方”和西方的力量进入大体均衡阶段，这个经济比重有可能影响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天平。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经济总量尚不到美国 5% 的时候，美国就向中国伸出和解之手，欲联合中国抗衡苏联，而中国主动对外开放，对推动冷战的结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若中印等国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后，仍愿意与“全球南方”群体一道，并以“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寻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中不公平、不平等的规则体系，那么，未来以中等收入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南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将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包括中印在内的“全球南方”先行者做出何种战略选择，对仍将长期处在“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而言将是至关重要的。

① 按照两国政府发布的长期增长计划，印度于 2040 年左右、越南于 2045 年前后，均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② Rafael Reuven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Unev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World Economy’s North-South Stra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3, 2008, p. 583; “Global South Countries 2024,”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global-south-countries>.

③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October/groups-and-aggregates>.

三、“全球南方”更具多样性的战略选择

正如上文所述,随着国家间安全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面临的将是一个国际合作弱化、国家行为走向极端化和短期化以及国际体系趋向岛屿化的“泛安全化”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但不同于冷战时期,甚至可能比冷战时代更危险。正如前文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既是冷战对抗最激烈的阶段,恰好也是美西方经济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GDP增长率年均达到9.3%,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2倍以上,^①直到进入8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速才显著下降。经济学界对此的解释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不过,即便承认这一经济发展常识,我们也不能否认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不完全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概言之,即便外部环境显著恶化,甚至从局部“泛安全化”转向更大范围的“泛安全化”状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自身发展也不是全无机会。当今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类似的一点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同时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全球南方”群体,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话语权力层面都具有很强的优势,因而即便面临“泛安全化”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被动应对。但毋庸置疑,“全球南方”的分化仍将进一步扩大,其多样性的战略选择将不可避免。例如,有些“全球南方”国家已加入经合组织,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富国俱乐部”的一员,因而其行为模式在很多领域与“全球南方”截然不同。可以预见,具有能动性的“全球南方”,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将基于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地理方位以及与国际体系中更强实力国家间的关系,选择自己的战略定位。具体而言,随着“泛安全化”世界的兴起,“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选择将可能包括以下几种。

(一) 重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间国家”角色

在依附论所提出的“中心—边缘”国际结构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曾补充了处于中间状态的“半边缘”角色,松动了原本固定不变的体系结构,从

^① 钟飞腾:《日本的“新资本主义”与中美日关系》,《云梦学刊》,2023年第6期,第34页。

而为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寻找更加合适的位置提供了理论空间。^①如今，在“泛安全化”趋势加剧时，霸权国倾向于优先与盟友进行交易或者合作。很显然，如果贸然地站到美国的对立面，事实上也不符合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而对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完全站在中国一方恐怕也损害其国家利益，因为美国肯定会对其进行打压。而为了保持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中国也不会坚持让“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实际上，在安全竞争加剧时，那些能为各方提供平台和通道的国家更受欢迎。在主要大国之间相互牵制加深时，“全球南方”事实上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中间国家”角色。可以预期，那些靠近中心地带且有外交谋划能力的“全球南方”国家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例如，自 2023 年上半年以来，欧盟创造的“去风险”已经替代“脱钩”一词，成为美西方共同的对华立场。这种变化既说明美国力量的下降和美欧立场的差异，同时也表明国际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处于重塑进程中。美国为了拉拢欧盟，只能不情愿地使用欧盟构建的话语，这在过去是不常见的。2024 年 12 月初，欧盟新一届欧委会产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就任之初便首访乌克兰，她还表示，由于中俄接近，欧盟不得不对华采取更强硬的姿态。^②中国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影响欧洲安全，同样是较新的现象，从中方角度来看，中国的对欧战略也受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巨大影响。因此，在“泛安全化”的世界中，由于霸权国实力地位的显著下降，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这为“全球南方”寻找新的定位和切入点提供了重要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体系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加速重构为“全球南方”进行多样化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契机。当美国在亚太地区感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特别是其海洋霸权地位被动摇后，美国倾向于逼迫盟友追随自己参与印太事务。这种动向也表明了“中心—边缘”结构的改变，国际体系开始从过去的一个中心转变为多个中心。相较于美国，欧洲是国际体系中心的边缘地带，但欧洲在中国周边安全事务上的介入程度要甚于中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因而其远不是边缘性角色。从欧洲的角度看，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欧洲人对美国抽离欧洲事务的担忧随之加大，尽管欧洲主要国家均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4 年，第 133—135 页。

② Seb Starcevic, “Trump Must Be ‘Strong’ on Russia to Prevent Trouble with China, EU Top Diplomat Says,”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s-donald-trump-must-be-strong-on-russia-to-stop-rise-of-china-kaja-kallas-says/>.

有意愿加强欧洲防务，但经济实力的衰落使这一任务难以完成。虽然俄乌冲突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增加防务支出的需求，但是其国防支出能否大幅增加，也面临着欧洲福利社会的约束。一旦社会福利体制遭到冲击，欧洲的社会稳定也将难以维持，而这种非传统安全后果对欧洲的冲击，似乎不亚于战争对欧洲安全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欧洲移民问题和民粹主义崛起所证实。因此，欧洲的衰落预示着传统上美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趋向于终结，国际体系中传统的权力中心正在衰退、甚至走向瓦解，新的中心正在逐渐形成，这实际上较大幅度拓展了“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国际合作对象的空间。

（二）重构迈向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路径

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泛安全化”的世界既是危险的世界，同时也是蕴含着更多发展类型和机遇的世界。迄今为止，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探索了几波迈向现代化的新模式，为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样的学习对象。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处于“全球南方”阵营的领先地位，但因其体量较小，地理位置上距离美国很近，难以摆脱霸权国的结构性约束，因而其发展很快陷入停滞，基于拉美国家发展经验生成的“全球南方”发展话语也很快失去吸引力。^①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开始超越拉美，其中最明显的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人均收入相继超过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并在21世纪初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快速发展，更意味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世界因而再度出现了一批新的成功发展的国家，让“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有了更多的发展路径参考。

冷战时期，美国学界曾提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用于规劝第三世界国家跟随美国，但美国提倡的现代化模式遭到很多批评，一度陷入困境。不过，即便那些现代化理论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发展主导的状态，但在美国控制下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中，绝大多数决策者仍然推崇旧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美国的主导地位推动了这些发展知识的全球化。^②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通过采纳发达经济体提出的方案获得了良好

①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式微》，郭金兴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

② Janeen M. Klingler,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Janeen M. Klingler,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eterrence, Coerc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or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13-174; Zaheer Bab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1, No. 1, 2001, pp. 71-85.

的发展，但这一轮现代化的实践结果也出现了分化。事实上，即便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有其合理性，仍可以发展出各种新变体。“全球南方”国家不应执迷于某一种发展学说，而要广泛吸收世界上已有的关于如何发展的知识成果，并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创造性转化。

此外，发展经济学的不断重构和迭代同样说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回答是否有必要专门设立一门只讨论人均收入在 2000 美元^①以下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学科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曾指出，富国和穷国有着根本的不同，例如，两者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异较大，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方式和需求也不同，为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也要成为研究该国的政治学家。^②按现价美元计算，1980 年的 2000 美元还略高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平均收入的 3 倍，而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2 万美元。也就是说，刘易斯所设想的发展中世界仍是一批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 15.9%、高收入国家的 23.6%。而直到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才首次超过 1 万美元，占美国的 15.5%。^③因此，刘易斯的论断在当代仍有借鉴意义，对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其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纯粹的经济、政治或者其他学科的固定研究对象。这些国家在初始阶段或者发展中阶段是以混沌状态为主，政治、经济等问题彼此牵连和交织。而且随着现实的不不断变化，这些国家的国内制度也常常处于调整中。从全世界来看，取得经济成功的“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多。按照前文列出的 4% 的标准，在过去 60 多年中，全世界也只有不到 20 个经济体实现了这个基准线以上的增速。在这些经济体中，真正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恐怕只有中国、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④很显然，即便是这些成功发展的经济体，都没有固守某种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皆是紧跟国际形势，并不断调整其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

如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样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 2020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引发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许多猜测，但这种“崛起”也是相对

① 按照 1980 年的数值计算。

② W. Arthur Lewis,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o. 1, 1984, pp. 2-4.

③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参见《人均 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集团，<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view=chart>。

④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参见《人均 GDP 增长率（年增长率）》，世界银行集团，<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KD.ZG?view=chart>。

不平衡和不完整的，总体上看，“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愿景仍未实现。在1995—2016年间，“全球南方”之间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3%，远远超过世界出口总额的8%，但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贡献，2004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国，并于200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大国。^①中国的成功经验已经多次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比如21世纪第一个10年就出现了“北京共识”“伟大的经济转型”等论断。^②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很好地平衡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这种发展经验被进一步概括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这实际上也印证了刘易斯所言，若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必须懂得发展中国的政治。如今，随着“泛安全化”行为增多，美国让他国搭便车的意愿减弱，其他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寻找新的学习和模仿对象。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既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吸收传统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有益知识，也可以从新近成长起来的中国获取更新鲜的现代化经验。

（三）重构“南南合作”模式

“全球南方”的地位今非昔比，“南南合作”的空间也比以往更加广阔。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全球南方”仍高于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因而“全球南方”国家的“泛安全化”倾向要弱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远少于霸权国。在不少发达经济体推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政策之际，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仍愿意拥抱全球化，因此，“南南合作”的空间增量要远大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地理分布看，如墨西哥那样靠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远离发达经济体，它们与其舍近求远还不如就近抱团取暖。在这方面，地区化和区域合作是重要的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亚洲国家缔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RCEP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将传统的基于一国的原产地改造为多国共享原产地，这符合亚洲各国形成的新价值链构建特征。在过去30年中，由于吸收了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亚洲国家深度卷入区域价值链的建构，深化了彼此间的互利合作。过去，“全球南方”国家要么选择和发达国家合作，要么选择自力更生。现在，“全球南

^① *Forging a Path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8, p. 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2018d1_en.pdf.

^②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方”国家可以摆脱以往的二元选择困境，转向更加多元和多样化的合作对象，既可以与“全球南方”中保持中高速增长水平的经济体合作，也可以和“全球南方”中的专业化生产者合作，例如那些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获得成功的中小国家。

另外，在“泛安全化”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中一批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进行“南北合作”时则面临着显著的经济外交风险。由于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速和投资回报率，诸强国对这些收益率较高国家的争夺也将白热化、冲突性增强。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缺乏在国际舞台上历练的机会，对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规则的认知都不太到位，因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参与相对较弱。例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签署了一大批双边投资协定，但这些协定中的不少条款实际上使之受制于西方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与西方投资者没有爆发争端的时候，这些条款的功能是隐藏的，并不会被触发。而当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争端，向国际仲裁庭提交仲裁案时，其索赔金额之大往往远超“全球南方”国家的预期。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整理发现，在过去 10 年里此类争端的数量翻了一番，到 2023 年底已超过 1300 例，其中 70% 的案例发生于“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之间，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于能源供应和采掘业领域，在索赔成功的案例中，投资者得到的赔偿金额平均约为 4 亿美元。^①

此外，与传统上南北之间不平等的经贸关系相比，“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呈现出新的内涵。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就提出要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售价不稳定，影响了其国家预算。由于对财政收入估算不准确，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从未得到完全落实。对于彼时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尽管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却很难获得这类长期投资，因此，“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由于存在更多的相同点，彼此间反而更容易达成合作。截至目前，大多数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都是“全球南方”国家。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因为未能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而转向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绩已充分表明了“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强烈意愿。当传统的霸权国大幅度减少公共产品供给，甚至转向打压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时，“全球南方”国家联

^① “Facts and Figures 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November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4d5_en.pdf.

合自强的紧迫性比以往更加突出。而冷战后东亚的区域合作历程则表明，为了应对共同的外部危机，区域内“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是可以有序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的。

（四）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在发达经济体占据主导地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解释南北贸易的基本模型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该模型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立足的典型事实是“全球南方”国家出口原材料、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全球南方”国家出口的是国内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型产品，但是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受工业化国家控制，因此，出口原材料和资源的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其国际收支很容易受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将这种贸易结构作为构建依附论的重要证据，而依附论的一项重要政策推论便是，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并加强进口替代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为此，“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坚持了长期斗争，试图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总体看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以及增加值贸易的兴起，发展中世界的国际地位得以改善。集装箱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涌现，将生产链进一步切割成更多的生产环节，从而使那些没有资源、生产技术和资金的国家，只要发挥劳动力优势就可以加入国际生产链。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按照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预期，支持开放并参与国际市场是这些国家劳动力获取高额报酬的最佳选择之一，很多东亚经济体的经济起飞就是依靠了这一点。不过，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全球南方”国家仅凭熟练劳动力的参与，还不足以改变全球价值链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著名的“微笑曲线”就体现了效率逻辑支配下价值链各个部分的价值分配，一般认为占据“微笑曲线”两头的研发和销售等部分价值较高，而处于中间位置的加工制造以及原材料供给环节，则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为此，发达国家将价值较低的生产端转移到“全球南方”国家，而将研发和销售等环节留在本国，研发活动意味着需要保留高工资的技术研发人员，销售业务多数时候则产生知名媒体广告投放的需求。因此，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在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构建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很多国家就致力于培育优秀人才，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发展更具价值的高技术产业。不过，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仍难以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

当前，在“泛安全化”世界中，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缺少一个生产环节就会导致整个价值链难以运转，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过去含金量较低的原材料供给环

节就得到更多重视，这就使得“全球南方”中的原材料供应国地位得到显著提升。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 2024 年 2 月初生效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的供应链协议，传统上拥有丰富资源的东南亚国家受到美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华盛顿共识”盛行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屑于掌控原材料供应环节，认为其价值过低。但随着短距离贸易增多，海运通道风险上升，关键原材料的武器化现象频发，这些因素都迫使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原材料供给的价值。“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幅员广阔普遍拥有资源优势，不少国家也趁机要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本国加强投资，并加大对原材料的本地加工和利用程度。一些原材料丰富国家还尽可能让跨国公司在本国创造更多的附加值，既为当地提供更多优质的工作岗位，也推动技术外溢，为本地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提供更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泛安全化”趋势通过调整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也会给“全球南方”国家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在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南方”国家应更加注重制定原材料行业领域的国际规则，通过改善特定行业领域的全球治理水平，尽可能提升原材料资源的本地化价值，进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

结 语

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世界的形态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一个“泛安全化”的世界开始显现，各国均比以往更重视安全问题，很多人也担心“新冷战”的回归。一旦世界从发展为主导转向安全更突出的时代，国家以往的战略逻辑就需要调整。从对美博弈的角度看，中国需要更大的回旋空间，因而努力增进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就成为中国的战略考量。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全球南方”国家都与中国步调一致，“全球南方”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在这一基本前提下，本文尝试在新战略形势下，重新研判“全球南方”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其新的战略选择路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泛安全化”进行了进一步理论思考，并概括了从发展主导的世界向“泛安全化”世界转变的行为逻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是正和博弈的世界，而且传统上中国人反对零和博弈、推崇互利共赢，但我们无法阻止霸权国家实施负和博弈，即对崛起国采取损人不利己的战略举措。尽管负和博弈造成了双输的局面，但采取双输策略却是实力日渐衰落的霸权国的理性选择，因为按照霸权维系的逻辑，霸权国自认

为更能承受住消耗战，因而可以显著拉大与挑战者的差距、遏制挑战者的崛起速度，从而将两国的力量对比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对世界而言，霸权国的负和博弈思维使得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显著增多，“泛安全化”的逻辑越来越普遍，显然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如果世界从正和、互利共赢为主转向“泛安全化”阶段，那么国家间合作将弱化，国家行为将趋向短期化和极端化，国际体系也将越发呈现孤岛化。

不过，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非线性的。本文通过整理各收入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速发现，高收入国家最好的增长阶段恰好是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期，而发展中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在冷战后获得了“黄金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但低收入国家则始终停滞不前。因而，本文倾向于认为，所谓“全球南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崛起，更进一步而言，则得益于位于亚洲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持续崛起。为此，本文总结了可供“全球南方”参考的几种战略选择，即更为审慎地扮演“中间国家”角色、为参与大国博弈的多方提供交流平台、基于自身国情选择适当的现代化道路、在价值链领域以迂回方式尽可能防止“脱钩断链”、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而言，由于在“泛安全化”世界中国际关系孤岛化和近距离经贸关系重要性的上升，“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潜能被进一步激发，加上发达国家恐无力为“全球南方”长期提供资金，“全球南方”国家也需要进一步塑造有利于彼此合作的氛围和机制。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大时代，大国博弈客观上快速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这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和调整价值链各个部分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要更为明确地了解哪些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是可供参考的，发达国家时间遥远的发展经验往往缺乏直接借鉴作用，因而“全球南方”要更加重视中国等国的新近发展经验。

如今，中国是“全球南方”中最大的经济体，也被西方视作最大的挑战者，无论是从享有的国际地位还是面临的挑战方面看，其都不同于一般的“全球南方”国家。过去曾有观察家将中国界定为东西方间的沟通桥梁、大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但随着美国对中国遏制打压态势的加剧，未来这种角色恐怕不再那么明朗。面对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加强和“全球南方”的合作究竟还有多少选择空间，中国与“全球南方”加强团结合作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些问题仍有待学界进一步加以讨论。

（责任编辑：杨嘉宜）

The Emergence of an Overstretching-Security World and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the Global South

ZHONG Feiteng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greatly impact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analyzing future dyna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often the primary task for these countries whe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zero-sum and even negative-sum behaviors, leading to signs of a shift from a development-oriented world to a world whe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s increasingly overstretched.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such an overstretching-security world are negative-sum games and lose-lose outcomes. In such a world, the blurring of security boundaries leads to weakened cooperation; the cost-benefit logic gives way to negative-sum game logic, leading to extreme behaviors by actors; the emphasis on “avoiding losses” increasingly outweighs the consideration of “gaining benefits”, resulting in short-term behaviors by actors; the prevalence of values-based diplomacy has led to the camp-based and islanding tende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ality,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have vastly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ideal scenarios. Experience from history shows that in a development-oriented worl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gains by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 with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enefiting the most. However, in a world where the trend of overstretch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s on the rise and negative-sum behaviors are prevalent,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need to reconstruct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that is, redefine the role of an intermediary country in the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paths toward modernization, reconstruct the mode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restructure various link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o as to seek greater development spac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Global South, major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overstretching security, cost-benefit logic, negative-sum game